

20 世纪 70 年代中马建交的背景与意义

秦艳峰 喻常森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延安 716000;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中国; 马来西亚; 建交; 意义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 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对立的两极格局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演变。作为西方阵营跟随者的东盟国家纷纷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 双方关系大致经历了从对抗、中立到接近的过程。马来西亚作为东盟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率先实现与中国建交。本文主要分析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的历史背景、过程和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1)04-0060-08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Malaysian Diplomatic Relation in the 1970s

Qin Yanfeng & Yu Changs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words: China; Malaysia;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had great changes since the 1970s, and the bipolar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Soviet Union began to enter to a triangular system of China-US-USSR. As the followers of the West coalition, the ASEAN states also began to adjust their policies toward China. Among them, Malaysia is the first one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ase.

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马于 1974 年 5 月 31 日正式建交, 迄今已经 30 余年。目前中马关系发展良好, 两国在双边合作和地区事务上有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立场。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两国三代领导人长期以来的辛勤开拓以及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动。通过回顾中马两国建交的历程, 一方面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 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友好的基础。

关于马来西亚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首先比较注重华侨华人问题研究, 涌现出了一批卓越成果^[1]。关于马来西亚现状的综合性研究, 主要侧

重于当代马来西亚政治和法律两方面^[2]。而对马来西亚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特别是对冷战时期的中马关系研究, 由于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 相对比较缺乏^[3]。国外学术界对马来西亚问题及中马关系研究, 也以对新马华人社会的研究居多^[4]。国外学术界对中马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带有资料性的文集和评论^[5], 并大多带有对中国的政治偏见。本文试图通过收集尽量翔实的中外文献资料, 特别是当时出版的中国及马来西亚主流报刊资料和政府档案, 分析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何顺应国际格局的变化, 各自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 结束对抗, 建

[收稿日期] 2010-12-27

[作者简介] 秦艳峰,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喻常森,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

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鲜为人知的真实内幕和时代意义。

一 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格局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东南亚地区力量分布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外交战略。

1. 英国国力衰落

马来西亚原属英国的殖民地,自1957年获得独立后,奉行亲西方政策,主要依靠英美为其提供安全保护。但是,随着战后英国国力的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执政的英国工党内部有一派强烈主张英军完全撤退出远东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他们主张削减海外防务开支,把资源集中到英国本土。同时,英国撤军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即担心英国会被卷入一场“越南式”的战争。1967年7月刊行的《英国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国有意在1971年减少和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还表示准备终止同马来西亚的双边防卫条约,这不能不引起马来西亚对自身安全的高度忧虑。英马安全协定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防御内外威胁的有效保障,英军的留驻是马来西亚信心和安全的基础。对此,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曾公开表示“英国已丧失其作为领袖所应具有的力量和意志……因此,那些以前曾将英国视为领袖的国家明显感到空虚和不安。”^[6]为此,马来西亚必须重新寻求军事安全保证。作为一种安全替代方案,在马来西亚的积极游说之下,马来西亚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决定缔结一项五国防御条约,该条约于1971年10月31日英马双边防卫条约结束后正式生效。但是,五国防御条约并未使马来西亚安心,因为这是一个军事“协商”多于军事“行动”的条约,规定只有当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面临外部发动或支持的武装攻击或武装攻击的威胁时”才举行五国会商,有着明显的脆弱性。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拉扎克也坦率承认,在新的防务安排下,“防务的承担较之过去的马英联防协定更加松弛得多。”^[7]这种形势之下,马来西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其传统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2. 美国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

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开始后,美国精心布置了一个针对苏联和中国大陆的从日本、琉球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到印支半岛的“新月形”包围圈,

以防止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扩散。60年代中期,第二次印支战争爆发,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双重因素考虑,卷入越南战场并逐渐陷入其泥潭难以自拔。由于军费开支沉重,加上国内反战情绪高涨,1969年7月,尼克松上台不久,便推出了亚洲收缩战略,即“关岛主义”(又称尼克松主义)。该战略主张让同盟国分担一定的军事义务,并声明,在没有受到核威胁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应为自身的安全承担主要的责任。一旦有事,美国只限于进行海空支援。美国为自己在东南亚脱身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东南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呈现出的最大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外部共产主义侵略的暂时威胁,而是来自长期存在于那里的饥饿、愚昧、贫困和疾病。”^[8]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军,虽然仍保留了设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是对完全“依附型”的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心理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慢慢地在东盟国家间开始蔓延开来。马来西亚曾经指望“美国应作为一个约束、抗衡中国核威胁或任何别的常规侵略力量的国家而存在于东南亚地区”^[9]。美国从东南亚撤军,进一步弱化了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它们更担心其他国家会乘机填补因美国撤走而留下的战略真空。

3. 苏联抓紧向南方“渗透”

冷战前期,美苏两大阵营的战略争夺重点主要是在欧洲,苏联对东南亚的外交很大程度上只是对美国发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一种有限的回应。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力量受到牵制。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力特别是战略性武器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其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霸权。苏联开始考虑在东南亚地区实施海洋渗透战略,抢占东南亚地区的海峡控制权。随着印支战场明朗化,苏联逐渐调整对越南政策。首先是修改其“脱身”政策,大幅度扩大对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加快把越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把它作为向东南亚及整个亚太地区扩张的前哨基地。1969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抛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倡议后,南下步伐加快。苏联不仅从军事上希望南下东南亚填补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战略空隙,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苏联

的影响力在该地区国家日益增加的事实。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认为,“我们在亚洲开始感受到苏俄进攻的冲击,这样的进攻,我们过去未经历过。苏联人向该地区除了大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苏联存在的增长是否承认不了的。”^[10]这样,随着英国、美国战略收缩而来的苏联向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马来西亚国家安全面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外交政策调整的迫切性。

二 中马接近与建交历程

1.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战略,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指针,奉行亲苏反美基本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重点是打破西方反华同盟,特别是涉及西方势力与周边国家结成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如日美安全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等。中国当时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通过支持亚洲各国的革命来动摇美国在各地扶植的反共反华政权,从而达到反美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向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与美国的军事对抗之中,打击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共产国际的分工,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和援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印度支那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相继建立,在它们的成立纲领中也明确提到要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紧密革命联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支持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道路,可供世界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借鉴”,中国支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正义革命斗争”^[11]。

1957年8月30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电拉赫曼总理,宣布承认马来亚联合邦,并愿意与其建立邦交。毛泽东主席的电文如下:“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西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12]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衷心祝贺马来西亚独立斗争的新胜利,表示今后“中马两

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将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必然有助于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13]但是,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却执意奉行亲西方反共、反华的政策,两国关系随即进入对抗时期。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两国对抗关系进一步升级。马来西亚建立后,中国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抨击“马来西亚”联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并指出“这个联邦的成立,使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复杂化,造成了对东南亚和平与亚洲和平的新的威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反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正义立场。”^[14]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中国也公开对之进行抨击,称之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15],继续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对东盟各国的共产党给予援助。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和破裂,导致两国的同盟关系名存实亡。1969年,中苏爆发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重兵,并叫嚣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苏联由盟友成为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一方面试图缓和与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的关系,对“尼克松主义”作出回应,接待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破冰”来访,从而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成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美两国在联合公报和相关声明中写入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意味着中美两国非正式结成了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伴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和正常化的实现,中国加快了与主流国际社会接轨的进程。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和提升,从而开拓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新契机^[16]。

2. 马来西亚外交战略的调整

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初期,奉行亲西方,反共、反华政策,指责共产党中国是马来西亚安全的最大外部威胁^[17]。马来亚政府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公开抨击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并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参与西方国家

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1969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期间爆发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史称“5·13事件”，使中马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大国战略的调整，马来西亚也相应调整了自己的安全战略。自从英国提出撤军计划以来，马来西亚国会就多次讨论马来西亚未来安全的走向问题，马来西亚担心该地区的军事真空和取而代之的防御安排无法有效建立。为此，鉴于当时东南亚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来自于外部大国插手东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马来西亚首先希望效法中立主义原则，试图通过建立东南亚中立区来排除外部大国的干预，实现安全本土化目标。在1968年1月23日的国会讨论之中，副首相伊斯迈尔（Tun Ismail）首次提出了地区中立化建议。在1970年9月拉扎克（Tun Abdul Razak）就任总理之后，马来西亚更是利用各种机会发起了外交攻势，争取国际社会对中立化建议的理解和尊重。马来西亚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复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1970年12月，拉扎克访问泰国期间表示“马来西亚呼吁真正的、受到大国保证的中立，以便东南亚国家能够自由发掘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利用自己民族的智慧来创造东南亚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努力实现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目标和理想。”^[18]1971年3月12日，副首相伊斯迈尔作为马来西亚代表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部长会议，表示“随着美国和英国撤离东南亚，马来西亚政府倡导大国保证下的东南亚中立化政策，该政策意味着东南亚地区不再被各大国分而治之。该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小国在大国的竞争当中充当牺牲品。中立化政策代表一个确保稳定与和平的规划。”^[19]在马来西亚的积极倡导和外交努力下，1971年11月27日，东盟五国外长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又称《吉隆坡宣言》。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新中国于1971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使马来西亚面临着新的对外战略选择。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最早对中美关系缓和作出反应的国家之一。早在1971年7月美国公布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之后，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就认为“这项中美关系的最新发展，尤以尼克松总统赴北京之行，证实我国的预测，这对我国倡议的东南亚中立化政策，无疑是一项令人鼓舞

的步骤。”因此，“大马乐意见到中美两国能促成更大谅解与宽容”^[20]。马来西亚积极倡导“地区中立化”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就是与中国改善关系。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沙菲曾这样概括实现“东南亚地区中立化”所必须达到的两个条件：一是东南亚地区国家联合起来，经过内部协商加强地区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中立化；二是世界三大强国：美国、苏联和中国需要对东南亚地区中立化做出保证^[21]。因此，获得中国的保证是马来西亚实现地区中立化外交战略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马来西亚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0年5月，曾对共产主义抱有很深成见的东姑拉赫曼首相也明确表示“马来西亚向来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成为合法代表，它是一个强国，是应受到所有国家欢迎的”。^[22]这是预示马来西亚对华政策改变的重要信号。同年10月，副首相伊斯迈尔指出“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反映出此机构的普遍性有严重的遗漏。”“我们不容否认，中国是一个核子国家，以其面积、人口、工业、军力以及它在亚洲的主要地位而言，它在此世界机构中应扮演重要角色。”^[23]马来西亚不失时机地调整对华政策，从而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3. 中马建交的实现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各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与马来西亚开始增加接触，积极探索建交的可能性。

对马来西亚在两国关系上摆出的新姿态，中国报之以积极的反应。首先在称呼上，中国主流媒体减少了敌对的宣传，开始使用了“马来西亚”一词。1971年1月底，中国红十字会向马来西亚遭受水灾的地区捐助了50万元人民币。1971年5月，应中国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和中国全国对外贸易企业公司的邀请，马来西亚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为名，第一次向中国派出非官方贸易代表团。该代表团共有成员19人，团长为马来西亚国营企业公司董事长东古·拉查利·宾·哈姆扎（Razaleigh bin Tengku Hamzah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称为东姑拉沙里，东古当时是马来商联会主席兼土著银行董事经理，后担任财政部长）。东古在出发去北京前称代表团的性质是作为普通公民来和中国谈论马来西亚的政策，而不是作为政治发言人去中国，“希望探讨增加对中国贸易的可能性”^[24]。虽然马来西亚极力声称代表团此行是非政

府的行为,但代表团出访中国却具有两项极具政治味道的任务:一是“与中国商讨马来西亚关于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主张,并试探中国的反应”;二是“调查扩大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橡胶和棕榈油出口的可能性”^[25]。实际上马来西亚政府此举是试探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希望借助此次贸易团访华,为建立马中两国邦交铺路^[26]。所以,也可以被看做是马中关系的“破冰之旅”。5月15日,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会见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同东古·拉查利团长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27]。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改称“马来亚”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在北京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会见和宴请了来访的全体马来西亚客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双方表示愿在平等、尊重、互惠和互利的精神下发展贸易关系,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邀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派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橡胶禁运政策,中国随即向马来西亚订购15万吨橡胶。这次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建立了两国的直接贸易联系,中马两国之间从此开始了正式接触,双方关系进入了缓和时期,是马中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开端。

1971年8月24-29日,中国应马来西亚的邀请,向马来西亚派出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张光斗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代表团,对马来西亚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25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和工商部长佐哈里分别接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代表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28日,在吉隆坡签署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代表团和马来西亚国营企业公司联合公报》,指出“代表团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实现在马来西亚非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所达成的关于建立中马直接贸易的谅解”。“双方认为,代表团的访问促进了两国人民更好的了解和友谊。双方表示希望今后将有更多的这类接触和互访。”商谈结果,中国方面同意迅速购买4万吨橡胶、5千吨棕油、5万立方米木材以及其他商品。马来西亚方面也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消费品、轻型机械和其他产品。双方保证将以

最优惠的条件对双边贸易提供方便^[28]。马来西亚对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非常满意,农商部长在《中马贸易协定的联合声明》签订后的讲话中指出“中马直接贸易有着可观的前景,而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注重中国这个大市场。”^[29]不久,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在同年10月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提案上投了赞成票。

1971年9月底到10月初,中国邀请马来西亚乒乓球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2年5月底,马来西亚派出了医生访华团来到北京,受到中国卫生部领导人接见。1972年9月,马来西亚乒乓球代表团再次来华参加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2年11月底到12月初,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代表团来华访问。1973年9月,中国羽毛球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受到了马方的热情接待,马来西亚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阿里·艾哈迈德为《马来亚通报》关于中国羽毛球队访问马来西亚纪念特刊题了词。题词说“我欢迎中国羽毛球队前来马来西亚。马、中两国友谊通过体育在迅速成长,我希望这次访问更加巩固两国友谊的联系。”^[30]

在民间交往的同时,1973年6月起中马两国开始秘密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建交会谈。马来西亚派出原驻联合国代表扎格里宾·穆罕默德(Zakriabin Mohammed)与中国派出的谈判官员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纽约进行政治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马中双方在“建交”和“解决分歧问题”的先后次序上有不同意见:中国方面希望两国先建交,后解决政治上的细节分歧问题。而马来西亚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分歧然后才能建交。马方并提出三个建交前必须解决的问题:(1)中国放弃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2)中国关闭“马来亚革命之声”等反马来西亚政府的电台;(3)中国需对居住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国籍作出明确规定^[31]。谈判进行到12月底,双方经过谈判均做出一定妥协,中国在舆论上大大减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抨击,同时逐步明确对海外华人的政策。1973年10月1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公开发言谈到“他们(海外华人)很多已取得居留国的国籍,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32]马来西亚也积极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好铺垫,在1972年和1973年间相继与蒙古、越南、朝鲜以及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这更加促进两国政治

关系的向前发展。到1974年1月1日,拉扎克在新年献词上称“马来西亚与中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协商阶段。”^[33]

1974年5月28日到6月2日,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57年以来踏上中国领土的首位马来西亚领导人。马来西亚代表团一行受到了中国最高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先念等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5月31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共包括六点主要内容:(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决定自公报公布之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2)两国政府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妨碍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两国政府认为,任何外国的侵略、干涉、控制、颠覆,都是不能允许的。双方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3)马来西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关闭它在台北的领事馆;(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马来西亚政府,并尊重马来西亚的独立和主权;(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到马来西亚是由马来血统、中国血统和其他血统的人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声明,它们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政府认为,凡已自愿加入或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都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那些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中国政府根据其一贯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尊重;(6)周恩来总理和敦·阿杜勒·拉扎总理同意,两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并按实际可能尽早互换大使^[34]。至此,中马两国结束了近20年的敌视和隔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中马关系从此翻开了新

的一页。”^[35]1975年1月,中马两国互派大使,完成了建交手续。尽管由于冷战格局制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中马关系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障碍,但是,中马正式建交,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 中马建交的历史意义

中马建交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意识形态分歧的典范,建交符合两国的实际利益,也极大地促进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中马建交对中国的意义

马来西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因此,中马建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建立和恢复。当获得中马建交的消息后,东南亚国家纷纷表示欢迎和支持。据报道,菲律宾新闻部长弗·塔塔德5月21日在接见记者时说,马来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这个地区(东南亚)来说是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他说,菲律宾“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泰国外交部长乍伦攀5月20日发表谈话,表示欢迎马来西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说,泰国本身也正在促进与中国之间的友谊关系。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说“我们希望中马建交有助于增进泰国和中国的了解和加速两国关系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外交部5月21日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这种良好的事态发展将“对整个东南亚带来裨益,并有助于打开使新加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5月20日发表声明说,对于马来西亚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印尼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原则上已同意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至于时间问题则由各国政府各自去决定^[36]。在中马建交的推动之下,1975年中国又同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也得到很大改善。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大大优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事实证明,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中国获得了对抗苏联威胁的重要盟友。在1978—1991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期间,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抵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和威胁。

2. 中马建交对马来西亚的意义

马来西亚也从与中国的建交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访华结束回国后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称“与中国建交是马来西亚自1970年9月采取新外交政策以来的最高成就”。他认为,与中国正式建交,使马来西亚找到了解决国内外问题的突破口。在国内问题上,解决了马来西亚最为顾虑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华人国籍两大问题;而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明确表明支持马来西亚倡导的“地区中立化”主张,使该主张的实现进一步得到现实的保证^[37]。因为,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坚持武装斗争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活动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马共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就成为制约中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中马建交后,作为一种过渡方案,中国政府制订了将党和国家的关系加以分开的外交原则,并承诺逐步减少对马共的支持,为最终解决马共的反政府武装问题奠定了基础。关于马来西亚华人问题,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鼓励华人加入当地国籍,效忠当地政府,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样,有利于马来西亚政府将华人问题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计划之中,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加入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看作是马来西亚多民族大家庭一员。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中国政府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和平使者。对马来西亚来说,中马建交的另一个重大的外交成果就是,使马来西亚首倡的地区中立化计划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东南亚地区中立化就失去了实施的可能和意义。同时,拉扎克访华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最高规格接待,“所获得的崇高荣誉,是过去从

未有过的,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些成就,不仅有利于马来西亚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且为今后中马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38]。

3. 中马建交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最大的国家,它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格局特别是亚洲战略关系的变化。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寻找亚洲的认同,以改善国内和地区生存环境。中马建交,中国承诺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至少减少对这一地区的外部压力,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复原力”(national resilience)与“地区复原力”(regional resilience)的提升。由于中马建交得到东南亚各国的积极反应,从而带动东盟各国寻求与中国建交的“蝴蝶效应”,从而开创了中国—东盟国家关系的新时代。这一点正如马来西亚首相拉扎克所称的,“马中建交,不但对东南亚和平有利,甚至对整个亚洲的和平也有惠益。”^[39]

结束语

总之,中马建交对两国具有双赢的价值。建交后,尽管两国由于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两国领导人能够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经济关系主导政治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总体态势是平稳友好的。冷战结束后,中马两国妥善解决了华人共产党武装问题,相互之间的信任大幅度增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马关系如同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一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双方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化。

【注释】

[1] 范若兰 《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林勇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郑树良 《马来西亚华文发展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论文情况不一列举。

[2] 廖小健 《世纪之交马来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祁希元 《马来西亚经济贸易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王虎 《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刘迪辉、汪新生 《东盟国家内外关系》,香港天

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朱振明 《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概述》,《东南亚》1994年第4期;唐皓 《独立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

[4]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ALOR JANGGUS: A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 BY KIYOSHIGE MAEDA, [TRANSLATION FROM JAPANESE BY SUMI HIRAMOTO GLUCK]. Maeda, Kiyoshige, 1920 - Kyoto, Japa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1967.

[5]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New Del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6] 赵晨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7] 《马首相指出五国协商防务问题，英今后不再自动防卫马国，马国防任务落在星马仔肩，独立国应该自主防务，不受干预》，（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70年10月30日，第1版。

[8] 赵晨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9]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125.

[10] 〈美〉罗伯特·唐纳森编，任泉等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11]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5 - 7.

[12] 《我国决定承认马来亚联合邦，毛主席和周总理电贺马来亚独立》，《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第1版。

[13] (《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新胜利》，《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第1版。

[14] 观察家 《“马来西亚”联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人民日报》1963年9月29日，第5版。

[15] 《美帝走狗拼凑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出笼，美国主子急忙为其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喝彩叫好》，《人民日报》1967年8月12日，第6版。

[16] 喻常森、王妃燕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7] 唐皓 《独立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第22页。

[18] Bilveer Singh, *ZOPFAN & the New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alaysia EagleTrading Sdn Bhd, 1992. pp. 39 - 40.

[19]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 Vol. 4, No. 1, March 1971, pp. 66 - 67.

[20] 《美国尼克逊总统应邀将访中国，首相表示欢迎，并形容此乃马来西亚预料中事，对东南亚中立化倡议系一令人鼓舞步骤》，《南洋商报》1971年7月17日，第5版。

[21] Savanamuttu Penerbit. *The Dilemma of Independence: Two Decades of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1957 - 1977*. University Malaysi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Penang, 1983. pp. 94 - 96.

[22] 《东姑昨日与杜鲁道讨论中国问题并交换对时局

意见》，《南洋商报》1970年5月22日，第5版。

[23] 《义斯迈在美告记者为着东南亚中立化，中国应入联合国》，《南洋商报》，1970年10月16日，第1版。

[24] 《大马首个访华贸易团今晨启程访问中国十日，希望与主人商谈促进双边贸易，可能时将邀中国贸易界人士前来访问》，《南洋商报》1971年5月6日，第5版。

[25]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161.

[26] 《联盟执行秘书曾永泰希望贸易团赴华，将为建邦交铺路》，《南洋商报》1971年5月1日，第5版 《首相称马中关系随贸易团赴华可能翻开新页》，《南洋商报》1971年5月5日，第5版。

[27]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会见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同东古·拉查利团长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人民日报》1971年5月16日，第1版。

[28] 《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代表团离吉隆坡回国，在吉隆坡和马来西亚国营企业公司签署一项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1年8月30日，第6版。

[29]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169.

[30] 《中国和马来西亚羽毛球队进行首次友谊比赛》，《人民日报》1973年9月23日，第5版。

[31] J · Savanamuttu Penerbit, *The Dilemma of Independence: Two decades of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1957 - 1977*, p. 101.

[32] Stephen Chee, *Malaysia's Changing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Malaysia II"*, ISEAS, Singapore, 1974. p. 50.

[33]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206.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4年6月1日，第1版。

[35] 朱振明 《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概述》，《东南亚》1994年第4期。

[36] 《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府和官员发表声明和谈话，欢迎和支持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74年5月31日，第5版。

[37] R. K. Jain edit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 - 1983*, p. 224.

[38] 《首相形容完成历史性任务，载誉归来，马中建交有利整个亚洲和平。东南亚中立化概念获各国支持，无国籍华人问题已达致具有远见观点》，《南洋商报》1974年6月30日，第5版。

[39] 同 [38]

【责任编辑：王 宣】